

文化的差异与多样性

贵州省民族文化学会第六届年会学术论文集



香港世界华人艺术出版社

1999



主编 / 邓康明

文化的差异与多样性

贵州省民族文化学会第六届年会学术论文论文集

书 名 文化的差异与多样性
—— 贵州省民族文化学会第六届年会学术论文集

主 编 邓康明

副 主 编 杨政银 田光辉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恒富 邓康明 石 争 田光辉

苏太恒 吴汉良 吴德海 李廷贵

杨长槐 杨政银 钱荫榆

出 版 人 一 墨

出版发行 世界华人艺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 203 5/F Yee Kuk St. Shamshuipo,
Kowloon, Hong Kong.

深圳: 东园路国企大厦永裕楼 23 层 A 座

电话: (0755) 2129411 9196950 邮编: 518031

承 印 深圳市一墨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印 张 10.13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一次出版 第一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62-8246-36-4

定 价 港币 28 元 人民币 22.5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史,从而构成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我们应当尊重历史,尊重各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今天各民族的文化,正是各民族既往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始终有一个正确认识中华民族既往文化传统的问题。正如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体系一样,我们的文化传统并非尽善尽美。它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来都是我们对待既往文化、对待传统的正确态度。只有这样,中华文明才能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向前推进。

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任务,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民族文化工作者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建设的文化,应当是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民族灿烂文明之中继承下来的优秀文化遗产,应当是体现现代社会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文化。

这本论文集所收的文字、著述,从总体上体现了上述精神宗旨。我们希望向更多的读者介绍这些文章,帮助读者了解贵州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真情实况,分析民族文化的社会功能,阐释民族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解说民族的风俗习惯、礼仪节庆和历史。帮助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贵州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从而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振奋精神,团结一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而努力。

目 录

编 者 的 话

邓康明 / 《文化的差异与多样性》序

吴永清 / 民族文化传播于未来.....1

陈 凡 / 民族文化与二十一世纪的贵州.....7

牟永生 / 坚持民族文化发展的 " 三面向 ".....14

李廷贵 /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22

王仕佐 尚顺昌 /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际关系的影响.....28

章海荣 / 文化转型中的格局和话语.....35

邓康明 / 历史文化悠远的国度 —— 意大利和梵蒂冈印象记.....45

田光辉 / 关于民族文化与经济的方法论思考.....49

李昌霞 / 面向世界和新世纪的贵州民族文化.....56

孙永宁 / 弘扬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建设.....59

张 勤 / 寻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合.....65

陈定秀 / 民族文化的未来与《民族志》.....69

邓康明 / 民俗文化研究面面观 (之一).....76

邓康明 / 民俗文化研究面面观 (之二).....81

邓康明 / 民俗文化研究面面观 (之三).....84

邓康明 / 民俗文化研究面面观 (之四).....86

刘定芬 / 少数民族妇女的昨天、今天和明天.....94

伍华权 / 法治与贵州民族法律文化的走向.....99

石朝江 / 布依族社会聚合的组织纽带.....107

李建国 / 论苗族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121

韦启光 / 论苗族传统思维方式.....129

杨昌国 / " 龙崇拜 " 新解 —— 说苗族服饰龙纹.....141

杨世章 / 苗族服饰文化与现代化	148
张寒梅 / 时空无阻——论苗族“杀牛祭祖”的“凝血”机制	155
吴正彪 / 苗族情歌浅谈	162
刘自成 / 牛文化试探	171
王秀盈 / 台江苗族亲属称谓与姓氏研究	180
石朝江 / 苗族历史上的三次大起义	186
吴正光 / 贵州民族村寨的保护与开发	201
张永吉 李登学 李梅 / 镇山民族文化保护村调查报告	207
王启平 / 论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	235
盘 森 / 瑶区文化发展初探	243
王晓红 / 谈青岩古镇民族饮食文化的发展前景	247
雷 岳 / 走向21世纪的贵州民族文化	251
杨秀绿 / 夜郎文化的曙光	258
杨政银 / 关于贵州尽快发展成为旅游大省的分析	270
牟代居 / 民族文化是发展贵州国际旅游的关键	278
戴学云 / 黔西南文化旅游现状及发展对策	285
黄 琦 / 旅游对民族文化的影响	292
毛名勇 / 发展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旅游业的建议	297
李筱竹 / 旅游文化与贵州经济开发	302
江东城 / 严寅亮与梵净山旅游经济开发	307
梁冬梅 / 《伊利亚特》与《可保古城传奇》比较研究	311

民族文化流播于未来

■ 吴永清

要说“文化”，其概念的涵盖面极为广泛，内涵极为丰富。在多达2至3位数的解释和定义中，就物质之外的“文化”而言，笔者道赞同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的描述民族学的界定观点。泰勒于1871年在他的名著《原始文化》中写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人类社会的历史证明，物质生产（“生产”还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和全部知识的精神生产，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最基本的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文化是人类（包括因具备了若干共同文化特征的民族）在适应环境和改造世界的的过程中，物质财富涵化为精神财富和行为方式的复合效应。这一定义揭示了文化质的特征，即（1）文化是人类或民族的社会产物，不是个人行为及其后果，它具有人类或民族的社会性。（2）文化是人类或民族自觉意识的产物，具有自立、自信、自强意识的能动性，好学、进取。（3）文化是人类或民族社会实践的产物，具有实践性，影响社会，直接为社会服务。（4）文化是人类或民族社会复合性整体，具有物质利益、精神力量和行为方式系统，及其相互作用的效应。（5）文化既是地域性、历史性的流动范畴，又具有人类、国家、民族间交流和传播的特征。简而言之，文化是人类或民族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的结果，是人类或民族人们社会实践的结晶和财富的总和，是人类或民族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和内在因素。文化的这种质的属性，使我们具体地看出文化的基本要素，即物质形态、精神形态及其两者兼而有之的制度形态的文化。由于文化是人类或民族适应和改造环境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晶，自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结果：一种是因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或民族，便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式、文化特点和文化素质，即错综复杂的客观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形成性质不同、模式多样、特色各异的国家的、民族的、地域性的文化。这说明：

人类社会或民族的文化是地域性、时代性的、历史的和发展中的流动性文化。另一种情况和结果是，由于生活在相同、相似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历史进程的人类、国家或民族，必然有其相似、相近的社会实践（包括生产斗争、人际关系、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形成相同、相似的文化模式、文化特点和文化性质，呈现了人类、国家、民族文化的共性与独特性之间的交错发展与繁荣的社会景象。

侗、泰民族文化共性实例

为了世界民族间、国家间的和平与友谊，科学进步，社会发展，应泰国暹罗学会邀请，笔者于1991年1月9日至24日随中泰文化学术访问团赴泰国，对泰国民族作了半个月的访问与考察，走遍了泰国中部、北部地区的13个府、27个古今社会文化重点门类，行程6500多公里，饱览了泰国民族历史文化和现代化发展进程，增进了中泰两国人民和学者间的了解与友谊，受益非浅。尤其令人感到有兴趣和值得冥思的，是我国侗族和泰国民族文化的若干共同特征。这种文化上的共同特征实例很多，略举例一些主要的供欣赏与研究之用。诸如：（1）两个民族都重糯稻，至今仍以糯米饭作为待客、赠礼的传统佳品。（2）都喜酸好腌，佳宴上都有腌鱼、腌肉、腌菜和酸汤佳肴。（3）进餐方式，食用糯米饭和腌鱼、肉、菜，都用手抓拿，不用勺、筷。（4）盛饭盛菜的工具有竹质“优”（“优”系侗音，意即“竹席饭婆”），不同者，泰族的“优”无系。（5）若来客多，进餐时都有用餐桌并连成长桌款宴佳宾的习俗。主方学者介绍说，美、英、法也有这一习俗。（6）都喜欢依山近水而居，宅旁有养鱼的池塘，或建造居室于水塘上，有水、稻、鱼、虾的田园风光。（7）都住干栏楼房。上居人，下多空旷，用作乘凉、堆放存物或圈养禽畜。所不同的，泰族民居楼房一般为平房，无二层楼，多为平顶。（8）都兴建有3至5套间长廊式住房，3至5户同住长廊楼房，这类住房形式多为同宗家庭联建。这种民居结构和居住习俗，宴请代表团的华侨王婷婷女士说她先生的《东南亚民居建筑考》（书名大意）中有充分的反映。（9）都建筑有路边凉亭，供行人憩息。仅有的差别，侗族地区仍限于民间，泰国早已纳入国家项目设施，从乡间建至曼谷郊外。（10）都用器具盛水于路旁，供行人饮用。不同者，侗区用木桶装水置于凉亭内和寨内鼓楼里，或修建山涧水井于路旁；泰族人则用陶罐盛水，搭棚置于路旁和宅居边，此类陶罐还当作文物展示在旅社、餐馆内。（11）在侗、泰两个民族语言中，有不少的同源词，其音、韵、义都同。例如，基本词汇中的“鸡”，侗语念“盖”，泰语念“该”；“灵魂”，侗语念“惯”，泰语读“坤”，等等。（12）村寨里都设有保护神，企盼保家护寨。区别在于神像不同，泰国民间塑一人形神像，站在高尺许的台柱盘上，立于住房前；侗族村寨

则建“萨”坛于寨中或寨旁，立“土地”神位于神龛下层，或建“土地”庙（小型石板屋）于村头寨尾。（13）都崇拜龙蛇，尊其为神。然也有差异，在泰国，蛇形神像无处不在，无寺不有，人们视其魔力大，能制灾凶，被当作神圣的吉祥物。侗族则视其有“灵”，认为敬之佑人，罪之害人；有的当图腾崇拜，建立“地神”（又称“蛇神爷爷”或“祖宗太公”）庙宇，供有蛇形神像。

这些实例证明，侗、泰两个民族文化中具有形同、义同、理同的共性现象和特点。形同，即前述13例文化现象的共同特点。义同，即文化现象的内涵同出于其原生意义，例如，世居于陆地水乡，当然依山近水而居，人们必然属于种水稻的民族；又因水源充足、沃壤厚土，适宜种植糯稻；食用的糯米饭可用“优”装，方便携带和进餐（糯食有很多优于粘稻的）；糯饭难消、耐饿，饮食喜酸，以酸促进消化，这既科学，又有营养，有益于健康；水乡、雨林地带，蛇虫必多，所以都崇拜蛇、龙，当然这与他们上古原始时代蛇图腾崇拜也有姻缘。理同，即道同、德同。在文化的形同和义同中就包含了各种文化内在的共同的公道与公德，例如修建路旁凉亭和搭棚备水、服务于人等文化现象，都是乐善好施，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并长桌宴宾客，也是出于爱心、光大人间友谊的表现。理同，体现了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高度境界，理应弘扬光大。

文化中的共性价值

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共性与个性的相互独立和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前者表现为事物内部的矛盾与竞争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后者表现为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规律性，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人类或民族文化中的个性与共性对立统一规律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研究各个民族文化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时，理当遵循这一规律，不能简单划一，固持民族文化“独有论”。

中国和泰国，侗族和泰民族，远隔重洋，相距万里，在它们保持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的同时，又有如此众多的超越国家和民族界限的文化共性现象，反证了上述“规律”的科学性。侗、泰民族各自的独特文化及其内在发展规律的阐述，不在本文之列。而他们的文化之间的共性现象，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书中说的人类或民族文化现象之间有“合乎规律的联系”的话作了很好的注释，值得探究。

第一、民族文化间的共性现象，是人类或民族人民缔造文化过程的客观的历史必然。摆在人们面前的文化现象多得使人眼花缭乱，但它们当中除了各自的独特个性之外，还由于人类本质上一致，人们生存与生活环境的相同，社会文化水

平的历史进程一致或近似等诸多因素,在人类、民族众多的文化现象中有着甚为广泛的共同性。例如,侗族和泰国民族同居处于地球热带,侗族地区和泰国北部山区为亚热带地区,有四季冷暖的区别;泰国绝大部分处在热带,只有雨季、旱季和凉季(三季中均可下种、插秧、收割)。侗族地区有丘陵地带的大小坝区,有山区的梯田和山涧河坝,良田遍野,漫山林木;泰国有山有丘陵,但笔者走过的地方都多为万里平川,无边无际。长期研究泰民族的外国学者见了中国西南地区,无不极为感慨地说:“他们(指中国西南各民族)能生存下来,简直不可思议!”然而,侗族和泰国民族都有适宜的气候条件、充足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这些都是他们形成农耕水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这些多少相同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是形成不同民族文化共性现象的一种历史必然。

人们也会同意这样的看法:乐善好施、广交朋友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出于农耕水稻生产和人们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卫星上天、航天站对接,仍然需要依靠集体的智慧;在应用科学技术尚未发达和普及的时候,对于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天灾人祸(如旱、涝、虫灾、疾病等)、通常的农忙季节和民间的红喜、白喜等大事,更加需要依靠人多势众。这就如同在侗族和泰族中一样,自然地形成和自觉地倡导了前面描述过的集体主义、友谊第一、助人为乐、热心公益的精神文明境界。这种优秀文化值得弘扬光大,带入21世纪。

第二、民族文化的共性现象,提示了人类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继承与发展的辩证法则。文化现象中的共性与个性关系,这里舍去表现于人类或民族文化内部的共性与个性关系,主要讲人类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所谓共性与个性关系。用民族学、人类学原理来理解文化的属性,这一问题便不难弄清。经多年实践与思考,笔者以为文化发生与发展的初期,是人类的文化(当然包括缔造文化初期氏族、部落之间的个性文化)。随着历史的进程,基于原始人群基础上发展起来、具备了苦干特定条件或基本要素而形成相对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时,人类共性文化便发展成民族个性文化(自然也含有共性文化因素)。当然,人们在研究民族文化,特别在总括众多的民族文化时,仍应用“人类文化”一词,在中国,可用“中华文化”或“中华民族文化”的概念。在这里,不是作文字游戏。“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各个民族都有一份功劳,它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财富。正因如此,个体民族不能、也不该把它“分割”独有。但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人在他的意识和实践中,在思考民族问题和对处理民族问题时,或在著书立说中,有意或无意地将历史上共性文化简单地理解为个性文化,甚至附会地归一于自己的民族文化,或者抓住某些能代表共性文化的代表人

——如在多民族中传播的远古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牵强附会地硬拉来算作自己民族的直接祖先，将文化属性混淆不清。这类情况在现今的文化市场上并不少见。笔者在想，也在耽心，这样的看法和做法是否科学、符合客观？是否会影响到我国事实上的多民族文化历史关系，滑入唯我大民族主义文化的泥坑呢？但愿这是“杞人忧天”。笔者只期盼：切忌仅因概念混淆而引起不可收拾以至影响到后代的副面作用。人们既要看到人类与民族和它们的文化之间的区别，又要把握住它们之间的联系，客观地揭示出文化的原貌（尤其原生文化），正确阐述文化的科学规律。

文化从人类文化到民族文化辩证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物质产生、物质文化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发展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一切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中具有客观的继承性和创新性规律。正如人们已经知道的事实：今天的民族文化是历史民族文化的发展，又是未来民族新文化的基石。总结历史文化，继承其珍贵遗产，创造、发展和繁荣民族新文化，已历史地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我们相信上述存在的民族文化观念和实践上的问题终究会得到圆满的科学回答，那样就会带来一个贵州各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春天，3000多万各族人民的贵州社会也将同全国各族人民、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迎来一个会有更多的和平、更加稳定、更大发展和繁荣的21世纪。

第三、民族文化的共性现象，还揭示了人类文化的渗透、传播和流动的内在规律性。世界人类，或世界各族人民，他们固有的也是共有的那种基于对无限丰富的物质文化的追求所具有的上进心理、对爱与美的追求美德，启动、促成和加大了一切文化的渗透、传播和流动性。文化中的这种内在的主动借鉴、吸收和“拿来主义”，在中外历史和各民族古今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中国古代发明的纸张、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化的四大贡献。而这些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使用，随即相继传遍全球，无法估量其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启示力量和社会效应。可以毫无不夸张地说：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人类文化流动和传播的历史中，功德无量！又如，中国最优秀的建筑物

侗族鼓楼、风雨桥（又名花桥）等（还有凉亭、民居建筑等），在世界建筑艺术文化中，堪称一绝，公认为人类建筑文化的瑰宝。如今侗族建筑艺术珍品，已走出侗乡，移植于世界。在北京、深圳、纽约、费城，侗族鼓楼和风雨桥等建筑艺术文化，已为世人赞不绝口。它说明：越是民族性的优秀文化，就越具有世界性价值。这也是人类求上进、尽善美、献爱心所驱动着的文化流动的表象和成果。再比如，珍视友谊，这应是人之常情、常理。历史上最著名的进化论的奠基

人查理·达尔文曾经说过：“谈到名声、荣誉、快乐、财富这些东西，如果同友谊相比，它们都是尘土。”中国人曾将以人的才能和德行为标准、不计年岁长幼的“忘年交”列为座右铭。古今中外的人们之所以如此珍视友谊，是因为他们知道：友谊可以凝聚，一群人、一个学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世界范围的人，都如此。凝聚的力量是无比的，集体的力量与智慧总是超越个人的！这也是人类的或民族的文化财富，是人类文化渗透、传播和流动的内在动力。历史进程告诉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共性文化将越来越多，在遥远的未来可能会基本取代个性文化，虽然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对立统一规律具有永恒的性质。

文化在共性与个性辩证运动中发展

人类或民族的物质、精神、制度的文化，是历史的。它一般地在相对静止（即文化的固定性）状态中绝对地流动（含交流与流向）着，永远处在历史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因为，文化起源于人类的劳动与创造。人类为了生存和永不停顿的发展，劳动和创造便具有永恒的客观性。永恒的劳动与创造，决定了人类文化发展也是永无止境的。而且这种文化发展不是简单量的积累，而且文化的质变，是文化现象内部诸多因素间的有机联系、彼此制约和优胜劣汰中的质变的成果。和劳动与创造一样，这种质变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一动力的启动、催化和规律的作用下，人类文化必将迎来一个又一个新的纪元。

6

贵州自它的行省区域基本形成以来，已历时260多个春秋。早已世居在这块国土上的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白、瑶、壮、毛南、蒙古、仫佬、满、羌等17个民族和尚待科学认定的人们共同体兄弟，共同缔造了贵州绚丽多姿和丰富灿烂的社会文化，这是推进贵州民族文化大流动、大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内在动力。如今的贵州已列为我国内陆开放、发展的省区，为贵州赶上快速发展的时代步伐，跻身于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行列，实现我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贵州参加世界经济大循环，把曾经希望过的“赶超世界先进”逐步变为现实，提供了机会。如果我们再不忧虑，再不打破贵州历来的闭关状态，再不奋起直追，加快发展自己，贵州就不但甩不掉落后于人半个世纪的帽子，还会拖了全国发展的后腿，贵州还将被世人讥笑！

民族文化与二十一世纪的贵州

■ 陈 凡

二十一世纪满怀人类的希望即将来临,在这众多的希望中,属于贵州各族人民有多少?托起这些希望的又是什么?若只看丰富的自然资源,会使人盲目乐观,若只看现有的智力结构和财力状况,又会导致“富饶的贫困”的悲观。本文认为贵州民族经济是全省社会经济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进行的民族文化跃迁将使民族经济产生相应跃迁,从而成为二十一世纪贵州实现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一、独特的贵州民族文化

所谓民族文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定义,是指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总体,①由4个文化层面组成。民族文化的分布和经济生活两个文化丛结形成第一个层面;社会组织、语言、习俗三个文化丛结形成第二个层面;知识、技能、社会传统形成第三个层面;信仰、伦理道德、民族意识、文艺形成第四个层面。②本文的贵州民族文化指除汉族以外的贵州各民族生活方式总体。由于历史的原因,贵州各民族文化进化程度不一致,使贵州民族文化具有许多独特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文化类型极差大。形成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是解放前贵州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极不平衡造成的。解放前贵州苗族地区一般停留在锄耕农业阶段,与汉族地区相比,中间相隔了畜牧经营阶段和定居的集约农业阶段,彝族地区处于农牧结合的发展阶段,仡佬族聚居地区与苗族相近,布依族、土家族、水族的发达地区则与汉族的经济发展相近,大致属于集约农业阶段,而瑶族地区还有相当部分尚处于采集狩猎向锄耕农业过渡的阶段。解放前各民族间的发展差异决定了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地区的社会形态仍与内地汉族地区有差异,而这些差异必然导致文化上的类型差。

合子文化。合子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实体,其形成一般要有3个条件:特殊机遇,特殊环境和外力迫使下的结合冲动。

③特殊机遇指由于生存环境的动荡,包括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动荡,使单纯地延续原有文化受到障碍。为了应付生存环境的挑战,该地区民族不得不接纳异族的某些文化因子。特殊环境指合子文化的形成,只能在多种文化可以勉强延续,但又都不能全部发挥效益这样一种多种文化交织的地带。

贵州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正好具备了上述条件。从历史上看,贵州地处西南几省中心,是兵家争夺之地和商贸必经之地。这期间汉族的统治、土司的压迫、军阀的混战,使贵州各少数民族生活在多重压迫之下,生存环境极为动荡,而小聚居、大分散的地域分布特征,使他们不可能固守自己的文化而必然并行接纳汉族和其他民族文化。此外,贵州介于边境和中心发达地区之间,比边境地区和省份更直接感受到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文化的冲撞影响,这种影响使贵州民族文化更多地包容了异族文化因子,形成典型的合子文化。

不完全的农业文化。文化人类学的双重进化论以各民族的经济活动为基点,把民族文化分为五种类型:狩猎——采集文化,斯威顿耕作文化,畜牧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对照各种类型特征,贵州的苗、布依、侗等9个人口过10万的民族文化基本属于农业文化,而这9个民族的人口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1.72%,为此可以说,贵州民族文化基本属于农业文化。但是目前这种农业文化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农业文化。解放40多年来,由于党和政府关于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非农产业,尤其是工业在该地区有了长足发展。1990年,全省民族自治地方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达到46.34%。④工业的发展,表明一部分工业文化因子正在原有的农业文化中存活并逐渐遍及,贵州民族文化正处在从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过渡的时期。

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文化演变阶段,不同的文化因子并存交错,使贵州民族文化内部新旧文化,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撞时异常激烈。这些冲撞必然影响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产生其他地区和其他类型的民族文化所没有的独特问题和现象,从而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乃至全省的现代化进程。

二、民族文化对二十一世纪贵州的影响

到二十一世纪,贵州将与全国同步进入工业社会,实现四个现代化。由于现代化的目的就是要为贵州各民族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文化,即一种全新的具有工业社会特征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所以实现这一目标只能通过民族文化跃迁来达到。

民族文化跃进是民族文化演化三大类型——族内演化、族际演化、突变演

化中的最后一个类型。前两种类型不过是民族文化自身演化和族际间的互动,不能产生新的更高进化阶段的文化,只有在这二者共同作用以致发生共振,使处于特殊状况和特殊时期的民族文化发生质变,造成了该种文化在一般进化级中的整体性突变,由低一级跃入高一级,形成突变演化,即民族文化跃迁。

那么,贵州民族文化有无跃迁的可能呢?

“潜势法则”是文化人类学中用以说明文化跃进条件与时期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民族文化跃迁必然具备一定条件,这就是发生文化跃迁的民族往往不是当代最发达民族,而是生息在发达民族的边缘和与其它民族交错分布的结合地带,综合了异种文化特征的合子民族。文化跃迁的时机是:合子民族还来不及通过特殊进化达到与生存环境的适应,而这一生存环境又是多变的,以致该民族不能在简单地延续已有的文化中生存,而必须探索构建全新的文化。

⑤显然,潜势法则给贵州各民族带来了美好的前途和希望。因为按照这一法则,贵州各少数民族均属于潜势民族,民族地区许多原被看成是劣势的不利因素,实际是蕴含着优势的有利因素。首先,许多发达地区的经济目前虽处在全国前茅,但其发展过程已暴露出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如人口膨胀,失业增加,交通紧张,资源缺乏,环境污染等。这些问题严重牵制了发达地区的进一步发展。而处于发达地区边缘的贵州民族地区,目前虽落后一步,但有较大潜力,表现为:与边境省区相比,它有就近借助发达地区先进文化的有利条件;与发达省区相比,不仅无发达地区严重社会经济问题的困扰和负担,而且还有发达地区所没有的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一时电动机成熟,必定能够后来居上,其次,贵州民族文化是合子文化这一特征,使贵州各民族文化具备了接纳和消化异族文化因子、现代文化因子的条件,先进文化能够在这里更快的成长和发展;改革开放给了贵州民族文化跃迁的宝贵时机。国门的开放,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竞争的冲击,四川、湖南、广西等周边省区的发展,使贵州各民族生境发生巨大变化和动荡,使贵州无论是哪一种文类型中的民族,都不能再按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生存下去,而必须构建新的文化——工业文化,实现向工业文化的跃迁。

民族文化跃迁的条件时机成熟,意味着文化跃迁对于贵州各民族来说不是虚无缥缈的事,由此,二十一世纪实现现代化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幻想,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和可以实现希望。明确这一点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表现为:一是能坚定贵州各族人民实现现代化的信念。坚定的信念是实现任何宏伟目标的前提,没有信念的行为将是较弱无力和盲目的,反之则会由坚定的信念引发强大的驱动力;二是能增加各族人民的紧迫感,从而加快现代化的步伐;三是明确了现

代化过程中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从而减少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浪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应紧紧扣住如何促使民族文化跃迁来进行,否则,盲目照搬其它地区现代化模式,只会造成劳命伤财,徒劳无功的结果。

综上所述,即将实现的文化跃迁是贵州民族文化对二十一世纪贵州产生积极影响的主要表现,是各族人民的希望所在。但也必须看到贵州民族文化中同时也存在着许多有悖于文化跃迁、阻碍贵州现代化实现的因素,其中文化类型极差大这一特征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尤为明显。

影响之一是参差不齐的生产力水平直接影响民族经济平衡发展。经济生活发展阶段上的类型差是民族文化类型差的重要表现,这一差异使各民族地区间的生产力水平差异较大。一般来讲,交通较发达、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已经开始或正在开始实现农业现代化,而一些偏僻山区则停留在刀耕火种或十分粗放的耕作水平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差距必然造成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从而影响全省现代化的同步进行。

10 影响之二是落后的生活方式与高低不一的人口文化素质间接影响民族经济发展。不同类型的经济生活形成了地区间和各民族间特殊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对经济发展产生反作用,主要表现为民族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愿望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目前贵州各民族的消费结构仍以饮食为主,所占消费比重大,而用于穿着、娱乐、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消费较少。据统计,1989年贵州民族地区农村人均生活费支出359元,其中吃、穿、用、住、烧分别占71.8%、8.5%、7.9%、6.0%、5.6%,人均文化生活服务支出仅38.22元。在个别边远山区,还有更特殊的消费方式,一些大型的消费活动往往不是在个人之间实现,而是在家庭中按人头分享,如苗族地区鼓藏肉的分配就是如此。这种落后的消费体制和消费水平,一方面很难刺激本地企业生产积极性及商品市场发育,另一方面由于落后的消费体制而形成落后的消费心理,使民族地区很难在短期内适应向工业社会、城镇社会转变中出现的高消费、超前消费等现代消费趋势,结果使外来较先进的产品和企业很难在当地发挥幅射作用。

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素质解放四十多年来虽有很大提高,但仍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贵州少数民族文盲率为43.10%(文盲率为15岁以上人口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人口占同龄人口的比重),比贵州省平均水平的36.73%高6.37个百分点。各民族之间差距更大,在14个世居民族中,文盲率最高的瑶族为52.8%,与文盲率最低的满族的14.36%相差38.50个百分点。如此低和如此悬殊的人口文化素质,使贵州民族地区很难

与内地在经济发展上步调一致。

影响之三是各民族经济生活地区特化形成的某些落后意识和心理特质,阻碍着经济的发展。长期自然经济的影响,地理环境的限制以及各民族习俗约束,使许多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商品意识十分淡薄,仍视经商为不光彩的事,只习惯于以物易物或由买主随便出价的交换方式,山区商品市场很不发达。据1985年对贵州省26个贫困县的调查,26个县有29%的乡和60%的村不通公路,商品集市稀少,一般约170多平方公里才有一个集市,每个集市负担的面积比全省平均水平多80平方公里。从江县平均366平方公里才有一个集市,榕江县平均118平方公里有一个供销社,农民购买常用生活品和销售农副产品往往条走几十里山路。商品意识、商品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出,缺少这一前提出,正是贵州民族经济难以起飞的症结所在。

长期封闭或半封闭式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使保守、安于现状、依赖外援等心理在一些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群众中较为普遍。如织金县一村民组19户人家,吃粮年年靠国家补助。该村民组拥有800亩草场,却只养了2匹马,4头牛和12头猪,大多数壮劳动力呆在家里“没事干”;另有一农民长期住山洞,村里给他盖好房子也不搬进去住,理由是风水不好,万一孩子死了村干部不负责。如此心理素质和思想意识显然与正在来临的充满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和工业文化格格不入。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不良心理往往会形成各种无形的障墙,阻碍各民族群众与现代生活的融合,以致影响民族经济的发展。

上述种种消极影响若得不到正确的处理,必将大大牵制和阻碍,甚至抵消我们为民族文化跃迁所作的努力,而民族文化跃迁实现不了,二十一世纪的贵州希望终将成为纸上谈兵。为此,如何防止传统文化消极影响,寻求民族文化跃迁之路成为实现二十一世纪贵州希望的关键一环。

四、对实现贵州民族文化跃迁的几点思考

贵州各族人民为实现从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跃迁的努力,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从中央到省内各级政府在物力、人力、财力上都给予了巨大投资,但收效甚微。许多工厂企业建起来又倒闭,许多先进技术设备,引进来又搁置不用,许多产品做出来卖不出去,大额的扶贫款发下去却收不到理想效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努力忽略了贵州民族文化特征和民族文化跃迁中的整体性原则及自我更新原则。整体性原则认为,民族文化跃迁将触动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种整体性的变动。为此,在实现民族文化跃迁时,应全面考虑民族地区的生活习俗、生境特征,而不应指望通过引进一两项技术,修建几个工厂来改变该地